

《喧哗与骚动》三兄弟视角分析

王艺睿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32629/mef.v8i20.17986

[摘要]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通过实验性叙事呈现康普生家族的衰落,其中凯蒂·康普生虽为情感核心,却始终缺席第一人称叙述。本文以韦恩·C·布斯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为框架,分析班吉、昆丁与杰森对凯蒂形象的主观建构:班吉以感官化叙述呈现母性与本真,昆丁将其符号化为贞洁与荣誉的载体,杰森则基于功利与怨恨进行污名化。三种叙述叠加使凯蒂成为无法自我发声的多面体形象。研究显示,福克纳借此解构人物真实性,并揭示南方父权文化对女性主体的压迫,凯蒂的沉默构成其悲剧核心。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 凯蒂; 不可靠叙述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Image of Caddy: The Brothers' Perspectives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Yirui Wa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employs experimental narrative to depict the decline of the Compson family, with Caddy Compson as its emotional core, yet absent from first-person narr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Wayne C. Booth's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to analyze how Benjy, Quentin, and Jason subjectively construct Caddy's image: Benjy's sensory perspective conveys maternal and authentic qualities; Quentin symbolically frames her as the embodiment of chastity and honor; Jason distorts her through utilitarian and resentful motive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unreliable accounts renders Caddy a multifaceted figure deprived of self-expres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aulkner deconstructs conventional notions of character realism and exposes the oppressive influence of Southern patriarchal culture on female subjectivity, with Caddy's silence constituting the core of her trag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Caddy; unreliable narration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高度实验性的叙事结构和对人性的深刻书写,成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小说通过四个不同叙述视角,展现了南方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并深入探讨了时间、记忆与道德等主题。作为家族核心人物之一,凯蒂始终未获得直接叙述权,她的形象完全由他人之声建构而成,尤其通过班吉、昆丁和杰森三位兄弟的叙述被不断拼合与重塑。这种“沉默”的存在方式,使凯蒂成为一个典型的由不可靠叙述塑造的人物。韦恩·C·布斯提出,不可靠叙述者因其认知局限、情感偏见或价值立场,无法客观呈现事件真相,这一理论为分析凯蒂形象的多重建构提供了重要框架。本文以不可靠叙述理论为基础,考察三位兄弟叙述中对凯蒂的主观投射与情感偏见,力图在多重失真的话语背后重构其较为真实的人物形象,并揭示凯蒂在挑战美国南方父权道德与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关键意义。

1 班吉的叙述: 感官感知与依赖

《喧哗与骚动》首章由班吉叙述,其特殊性在于彻底瓦解了传统叙事的逻辑秩序。作为智力永久停留在幼童阶段、缺乏时间意识的“白痴”,班吉构成了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不可靠叙述者”。然而,他的不可靠性并非源于主观欺骗或道德缺陷,而是来自认知结构的残缺。在班吉的意识中,线性时间、因果逻辑与社会规范均不复存在,世界仅由气味、声音与触觉等碎片化感官经验拼接而成。

正是在这种非理性的感官叙事中,凯蒂的形象被剥离了社会评价与道德判断。由于班吉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关系,凯蒂并未以具有完整社会属性的女性形象出现,而是被简化为情感意义上的存在:她“闻起来像树一样”,象征温暖、安定与庇护;她是寒冷中的火炉,是黑暗中唯一恒定的光。在班吉

的世界里，凯蒂不仅是姐姐，更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唯一的情感纽带。

这一形象的形成与康普生夫人的母职缺位密切相关。康普生夫人沉溺于自怜与家族荣誉，对班吉的残疾充满羞耻与排斥，其所谓的“怜爱”实则是一种情感放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凯蒂对班吉的真实关怀。当母亲决定更改班吉的名字以掩盖家族“耻辱”时，凯蒂以情感回应班吉的创伤：“她的头靠在我的膝上，她哭着，抱着我，我也开始哭了”（Faulkner 65）。这一场景标志着凯蒂在班吉精神世界中“代理母亲”角色的确立。

凯蒂的母性特质在另一段关键对话中得到集中呈现：“你不是可怜的宝贝。是吗？是吗？你有你的凯蒂。你不是有你的凯蒂吗？”（Faulkner 9-10）这不仅是安抚，更是一种情感承诺。在班吉缺乏逻辑与时间的意识结构中，这种承诺具有恒定而不可撼动的力量。凯蒂以无条件的爱填补了班吉情感世界的空缺，成为康普生家族中唯一不带功利色彩的情感来源。

与此同时，班吉视角下的凯蒂始终与“丧失”主题相连。由于时间在其意识中是并置的，凯蒂的每一次出现与离去都被体验为永恒的获得与永恒的失去。“树的气味”这一意象尤为关键，它象征着纯洁、自然与情感的稳定。然而，随着凯蒂步入青春期并觉醒性意识，这一气味发生变化。班吉通过洗澡、哭泣等细节，直觉地记录了凯蒂的转变。

尽管班吉无法理解凯蒂行为的社会动因，但他的叙述捕捉到了凯蒂性格中最核心的矛盾：她对班吉的爱是其身上最后一块未被污染的情感领地，而她对自由的渴望与对家庭压抑的逃离，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班吉的“遗弃”。在班吉停滞的时间结构中，凯蒂始终是一个不断离去的身影。

总体而言，班吉视角下的凯蒂是一个被剥离道德审判与社会规范的形象。正是这种极端不可靠却不受理性干扰的感官叙述，使读者得以看见一个温柔、具有保护欲并承担母职责任的凯蒂。她的形象为全书奠定了情感基调，也使凯蒂在后续兄弟的叙述中，无论如何被贬损，都始终保留着不可抹去的情感底色。

2 昆丁的叙述：道德与执念

在《喧哗与骚动》的第二部分中，昆丁·康普生塑造了一个高度分裂的凯蒂形象：她既是南方传统价值中纯洁无瑕的“圣女”，又是导致家族衰败的“背叛者”。这一二元对立并非源于现实中的凯蒂，而是昆丁在精神困境与意识流叙述中建构出的主观幻象。昆丁混淆了“传统”与“非传统”的界限，将本应随时代变迁而调整的南方价值体系僵化为压制个体自由的清规戒律；正如全斌所指出的，这种“非传统”观念正是其家庭结构与精神困境的根源（全斌 38）。因此，昆丁叙述中的凯蒂并非真实个体，而是被不断审判或神圣化的文化符号。

昆丁对凯蒂的“爱”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理想化重构。正如任冰所言，《喧哗与骚动》将昆丁的精神疾患置于白人大家族衰落的历史语境之中，他既是精神疾患患者，也是没落家族的牺牲品（任冰106）。在其叙述中，凯蒂不仅是姐姐，更被视为抵御家族

衰败、捍卫南方荣誉的最后防线。为此，昆丁反复回溯凯蒂童年在小溪边嬉戏的记忆，试图通过冻结时间与自然空间，确证凯蒂（以及家族）的“原初纯洁性”。这种叙事策略剥夺了凯蒂作为独立主体的复杂性，将她固化为单一的道德象征。

当凯蒂展现出自主意志并与异性交往时，这一叙事结构随即崩塌。昆丁无法接受一个“具有欲望”的女性主体，转而将凯蒂塑造成需要被拯救的被动对象。当现实无法与其“南方淑女”模板相符时，他甚至通过向父亲虚构乱伦忏悔（Faulkner 88），试图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抹除凯蒂的“不贞”，并将她重新纳入自己所掌控的道德秩序之中。这一极端行为暴露出其深层的占有欲与叙事暴力。

昆丁的叙述同时揭示了其无法调和的道德冲突。作为康普生家的长子，他所继承的是一个濒临死亡却拒绝革新的传统。他病态地执迷于家族声誉与南方价值，并偏执地将二者系于凯蒂脆弱的贞操之上（刘聪颖 57）。在这一叙事框架中，班吉成为无法掩盖的家族污点，而凯蒂则被物化为维系家族尊严的筹码。当凯蒂的行为偏离其家族复兴的蓝图时，昆丁的“关怀”迅速转化为谴责与惩罚。凯蒂的真实情感在其关于“荣誉、血统与贞洁”的叙事中被彻底放逐。

从叙事学角度看，昆丁的不可靠性还体现在视角的局限与不在场性上。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他既在心理层面过滤事实，也在物理空间上缺席凯蒂成长的诸多关键时刻，其叙述充满断裂与留白，使凯蒂的形象愈发模糊。最终，凯蒂的主体性在昆丁的痛苦独白中被消解，沦为被父权伦理与兄长执念层层包裹的“空洞中心”，而昆丁的自杀，正是这一叙事无法自洽的终极结果。

3 杰森的叙述：讽刺与偏见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叙事基调由前两章的诗意与破碎骤然转变为冷酷、琐碎且极具攻击性的现实主义。杰森作为康普生家族最后的“家长”，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完全丧失了情感维度的凯蒂形象。在这里，凯蒂被彻底物化为家族解体的罪魁祸首和他个人失败人生的替罪羊。

从叙事学角度看，杰森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他的不可靠并非源于智力或时空的混乱，而源于其叙述动机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巨大偏离。杰森与作品“隐含作者”之间存在着剧烈的价值观冲突：他试图通过贬低凯蒂来确立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这种过度的恶意反而向读者揭示了他灵魂的匮乏。实际上，杰森的不可靠还体现为他事件选择性叙述与心理投射，他有意识地忽略对自己不利的细节，将家族矛盾与个人失败全部归咎于凯蒂。

他那句臭名昭著的断言“一次是婊子，永远是婊子”（Faulkner 206），不仅是对凯蒂个性的全盘否定，更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定罪。这种极端词汇反映了他试图通过抹黑凯蒂掩盖自己在事业上的无能。对他而言，凯蒂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亲人，而是一个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异类”，是他所有愤怒与怨恨的合法排泄口。

杰森对凯蒂的叙述完全服务于他的功利性目的。他不仅通过言语暴力在精神上驱逐凯蒂,更在物质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剥夺,他私吞凯蒂寄给女儿小昆丁的生活费,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他口中“正义”的极大讽刺。同时,他利用叙述操控权力,通过强调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强化了对凯蒂形象的控制,使她在叙事中不断被边缘化。

通过杰森对凯蒂求助场景的冷酷描写,我们看到了他扭曲的补偿心理。例如,他描述凯蒂在车后追赶女儿时的狼狈姿态:“我能从后窗看见她在我们后面跑。再开快点,我说。”(Faulkner 235)在这段描写中,杰森不仅缺乏基本的同情之情,甚至表现出一种近乎变态的快感。这种快感源于权力扩张——曾经那个被他视为家族骄傲(或障碍)的姐姐,如今沦为他股掌间的玩物。他通过报复凯蒂,在心理上弥补自己未能实现“南方绅士”梦想的落差,同时巩固了对家庭秩序的扭曲掌控。

在杰森视角中,凯蒂的形象通过女儿小昆丁进一步扭曲。他频繁利用“有其母必有其女”(Faulkner 224)这一逻辑,将小昆丁的反抗和叛逆行为预设为遗传性的堕落。这种叙事偏见不仅剥夺了小昆丁独立成长空间,也将凯蒂永远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通过这种心理投射和价值操控,杰森成功将自身的冷漠、自私与剥削伪装成家族名誉的维护,从而加深了凯蒂形象在小说中的道德污名化,也揭示了南方父权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长期压迫机制。

通过对康普生三兄弟叙述视角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凯蒂始终未以第一人称在小说中发声,其形象完全由多重不可靠叙述叠加而成。福克纳正是通过这种叙事留白,将凯蒂置于康普生家族的核心,同时又使她成为最为沉默的受害者。班吉、昆丁与杰森的叙述并未揭示一个“真实”的凯蒂,而是在各自情感与利益驱动下,投射出彼此冲突的形象:班吉视角中的凯蒂是感官化、神话化的存在,其不可靠性源于认知局限,却保留了凯蒂最纯粹的情感价值;昆丁将凯蒂符号化为贞洁与荣誉的承载者,

其道德偏执导致凯蒂主体性的抹除;而杰森则出于功利与怨恨,将凯蒂扭曲为自身失败的替罪羊。这三种叙述共同解构了传统小说中“客观真实”的人物塑造,使凯蒂成为一个在多重话语中不断变形的动态存在,并折射出南方旧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裂变状态。

4 结论

凯蒂·康普生是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隐形人物”。通过不可靠叙述,福克纳揭示了真实如何在主观的喧哗与骚动中不断遮蔽。凯蒂的“多面性”并非源于她自身的矛盾,而是康普生兄弟内心世界的投射:班吉的依恋、昆丁的执念与杰森的仇恨,共同构成了一座情感牢笼,将真实的凯蒂禁锢其中。从不可靠叙述的视角出发,凯蒂既是家庭情感的纽带,也是叙事碎片化的中心。福克纳借此不仅解构了叙事真实的稳定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张力,使凯蒂成为现代文学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之一。

[参考文献]

- [1]刘聪颖.母亲?情人?荡妇?——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形象解读[J].名作欣赏,2005,(10):57-59.
- [2]全斌.浅析《喧哗与骚动》中人物的内心塑造[J].语文建设,2015,(05):38-39.
- [3]任冰,张美杰.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精神疾患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24,45(03):103-110.
- [4]Booth,Wayne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 [5]Faulkner,William.The Sound and the Fury[M].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作者简介:

王艺睿(2000--),女,汉族,河北省沧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